

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丛书

童庆炳 著

文化诗学
理论与实践

童庆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童庆炳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1

(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丛书)

ISBN 978 - 7 - 301 - 26412 - 6

I. ①文… II. ①童… III. ①诗学—研究 IV. ①I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2679 号

书 名 文化诗学: 理论与实践

著作责任者 童庆炳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412 - 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址 <http://www.pup.cn>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67315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商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24 印张 397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5.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 - 62756370

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丛书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文学院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
主编：童庆炳、赵勇

目 录

导 言 延伸与超越	1	
第一讲 为诗辩护		
——文化诗学存在的前提	3	
第一节 西方历史上五次“为诗辩护”	3	
第二节 文学的独特审美场域	16	
第三节 文学世纪、文学人口与文学生命	25	
第二讲 走向综合		
——文化诗学的学术背景	32	
第一节 “十七年”(1949—1966)：“他律”作为权力话语	33	
第二节 新时期(1978—2007)：“向内转”与“向外转”	49	
第三讲 回应呼唤		
——文化诗学的现实依据	76	
第一节 现实文化存在状态与深度文化精神的寻求	76	
第二节 文化诗学的精神诉求	89	
第四讲 双翼齐飞		
——文化诗学的基本构想	101	
第一节 以审美评价活动为中心	101	
第二节 宏观与微观的“双向拓展”	115	
第五讲 深入历史语境		
——文化诗学支点	126	
第一节 当下文学理论的困局	126	
第二节 摆脱困局的出路	128	
第六讲 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		135
第一节 文学语言及其生成机制	136	

第二节	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	159
第七讲	抒情话语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	174
第一节	中国文学抒情言说的民族特色	174
第二节	中国抒情语言的文化意义	189
第八讲	文学叙事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	206
第一节	故事形态学的研究	207
第二节	故事形态的社会历史根源	215
第九讲	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	224
第一节	文学修辞与中外修辞批评理论的遗产	224
第二节	文学修辞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联	246
第十讲	中心、基本点、呼吁	
——文化诗学的开放结构	264	
第一节	“一个中心”	265
第二节	“两个基本点”	267
第三节	“一种呼吁”	269
第十一讲	人文与历史的张力	
——文化诗学的精神价值	272	
第一节	两种现代化的对峙及其在文学上的回响	272
第二节	历史、人文、审美三者的关系	286
第十二讲	审美文化:文化诗学建构的支点与方向	302
第一节	“诗意的裁判”:文学的审美品格与价值诉求	303
第二节	认识论——泛文化——审美文化:范式的变革 与更新	307
第三节	“审美文化”作为“文化诗学”场域的原点 与支点	312
第十三讲	中外个案	
——文化诗学理论的成功实践	317	
第一节	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兴”说和“意境”说	317
第二节	俄国文学理论的“复调”说和“狂欢化”说	331

第三节 李白《独坐敬亭山》解读	345
第四节 春天对严冬的感慨与沉思——读王蒙的 《杂色》	358
附 录 “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	
——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构想	366
后 记	380

导言 延伸与超越

今天我们首先讲“导言”，叫“延伸与超越”。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近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提倡“文化诗学”这种方法论。我在1994年出版的《文体与文体的创造》这本书里，就把文体和历史文化的互动关系揭示得很清楚，就是说把它们联系起来考虑。1998年我在厦门开会期间给《东南学术》杂志提供了一篇论文，叫《文化诗学是可能的》。紧接着北师大文艺理论教研室的六位教授共同给当时的硕士研究生开设了“文化诗学专题”课程，其中有我、程正民老师、李壮鹰老师、王一川老师、罗钢老师和李春青老师，每个人讲两三讲；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应该走“文化诗学”这条路。2001年11月7日，我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做了“走向文化诗学”的讲演。我的讲演非常不幸地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的一次讲演重名了。他是1986年9月在澳大利亚西部大学做的演讲，而我是在中央电视台讲的这个题目。我本以为他的理论叫作“新历史主义”，我不知道他后来把他的理论改名为“文化诗学”。所以有人觉得北师大文艺学研究中心的“文化诗学”是不是搬用了格林布拉特的一些观点，不过如此而已，实际上真的不是。我在以后讲课的适当地方，都会讲清楚北师大“文化诗学”的研究思想与美国学者提倡的“文化诗学”的思想和方法有哪些联系，又有哪些根本的区别。

随后我们又承担了北京市的教改项目“文艺学教学与研究的双向拓展”。什么是“双向拓展”呢？就是说文艺学过去的研究太狭窄了，我们要向双方面拓展，一方面是宏观的历史文化的视野，另一方面是微观的文本、语言的视野，把文学作为一个包含这几个基本维度的整体来加以把握。这个项目过了不久就完成了，并且获得了北京市教学成果奖。2001—2002年期间，我们中心出版了十卷本的“文化与诗学

丛书”，这十本书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研究对象是不一样的，但在方法上互相靠拢，都用“文化诗学”这样一种基本方法。“文化诗学”的方法论在我们博士论文的写作实践中也获得了成功，产生了一些优秀的博士论文，比如郭宝亮教授的《王蒙小说文体研究》，用文体学的方法研究王蒙。还有博士生写汪曾祺、铁凝，也有写古典的、理论的，只要这个方法用得好，都取得了成功。

今天，我首先要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文化诗学”的要点是什么。总体来说，“文化诗学”是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以来的延伸与超越。它受到文化研究的启发，也与美国格兰布拉特的“新历史主义”（后又叫“文化诗学”）有关联。但它的确是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实际出发，具有中国的内容和形式。它的要点有以下六点：

第一点，“文化诗学”是对新时期文艺学三十年反思的基础上，实现的一次延伸与超越。

第二点，实现了文学观念的更新。过去对文学观念有多种多样的理解，但它们都是单维的，“文化诗学”把文学看成有三个基本维度，它们是语言、审美和历史文化，认为文学是这三个维度互动、互构的产物。

第三点，实现了文学研究对象的位移。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下，主要是在语言、审美和文化的结合、穿越、往来中。

第四点，认为文学的基本价值在历史、人文与审美的张力上面。对于文学价值的判断是植根于现实，又回应现实的。

第五点，在“文化诗学”的视野中，文学批评的途径是一个中心，双向拓展。“一个中心”是以审美为中心，这是我三十年来一直坚持的东西，“双向拓展”刚才已经说过了，不再重复。

第六点，“文化诗学”将形成自己的一套概念和范畴。

上面就是我对“文化诗学专题”这个课题的简单导言。

第一讲 为诗辩护

——文化诗学存在的前提

文化诗学是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作为一种新的文艺学方法论提出来的。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仍然是文学,古今中外的文学。但是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种声音,那就是认为在所谓的“电信技术王国”的冲击下,文学和文学批评,甚至连同情书、哲学和精神分析也“在劫难逃”,都要向“图像”“臣服”,文学和文学批评将走向终结。意思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果文学终结了,那么文学理论和批评就失去了研究的对象,人们还提出各种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新说,也自然是无的放矢。现在人们还继续絮絮叨叨讲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方法论有何意义?所以这第一讲,我们必须首先要“为诗辩护”,阐述文学的独特的审美场域,证明文学现在存在着、发展着,将来也会存在着、发展着,文学的生命是不会衰竭的。

第一节 西方历史上五次“为诗辩护”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包括诗歌在内的文学一直处于崇高的地位,三国魏曹丕在他的《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辱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说明人会死去,而文学是不朽的,是永远不会衰亡的。就是到了明清的章回小说的时代,文学也被众多的普通读者所喜欢,从来没有人预言文学将消亡、将终结,所以中国从来就不存在“为诗辩护”的问题。

西方则不然,从柏拉图到现在先后有五次“为诗辩护”。就是说,他们一再预言文学将终结。西方文论史上从古到今始终存在一个“为

诗辩护”的论题，为什么像“诗”这样美好的东西，如此令人感动的东西，如此有魅力的东西，不能像中国古人那样去珍爱它，似乎是有罪的，还要替它辩护呢？问题究竟在哪里呢？总的说，在西方的古希腊理性传统和后来的科学传统中，文学往往被认为不具有价值，或不具有真理性，“诗”遭到责难，所以热爱文学的人们要一再起来为诗辩护。

一、西方文论史上第一次“为诗辩护”

第一次“为诗辩护”发生在世界古代文明开篇的所谓的“轴心”时期。当孔子（前551—前479）在东方的泰山脚下热情地赞美西周时代的古老诗篇，并精心地整理和挑选诗篇，终于整理出“诗三百”的时候，当孔子教导他的学生“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时候，当孔子语重心长地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时候，在西方，比孔子稍晚一些，在地中海的希腊，西方的圣人柏拉图（前427—前347）在他所设计的“理想国”里则控诉诗人的罪状，并准备把诗人从“理想国”里驱逐出去。柏拉图借苏格拉底的话，说诗人有罪，因为诗人把“摹仿性的诗”带进“理想国”来。其理由是，诗是违反真理的。他举出了三种床为例：“第一种是在自然中本有的，我想无妨说是神创造的，因为没有旁人能创造它；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第三种是画家制造的。”柏拉图认为唯有第一种床，即床之所以为床的“理式”才是真实体，才具有真理性，而画家笔下的床是摹仿的摹仿，“和真理隔着三层”。“我们现在理应抓住诗人，把他和画家摆在一个队伍里，因为他们有两点类似画家，头一点是他的作品对于真理没有价值；其次，他逢迎人性的低劣部分，摧残理性的部分。”所以他决定，“除掉颂神和赞美好人的诗歌以外，不准一切诗歌闯入国境”。^① 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西方文论最初的价值根据，是柏拉图所说的“理式”，是“神”，而不是素朴的人、人的情感与自然的契合。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不同意他的老师柏拉图对诗人的态度，起来为诗人辩护，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为诗辩护”。

^① 柏拉图：《理想国》卷十，《柏拉图文艺对话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63—83页。

亚里士多德为诗辩护的理由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认为诗人摹仿现实,“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他认为诗歌能够“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诗人拥有真理。^①但是,亚里士多德也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所摹仿的现实还有“最后之因”或“最先的动因”。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为诗作了辩护,可诗的价值根据并未完全站立在确定的大地上面。“希腊人是靠‘理性’来追溯价值之源的,而人的理性并不能充分地完成这个任务。希伯来的宗教信仰恰好填补了此一空缺。西方文化之接受基督教,决不全出于历史的偶然。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上帝正为西方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存有的根据。”^②西方文学和文论在中世纪沦为神权的“婢女”也就可想而知了。

二、西方文论史上第二次“为诗辩护”

第二次“为诗辩护”发生在文艺复兴之后。这是在神权的面前为诗辩护。“文艺复兴”这个译词很容易引起人的误解,以为是文艺得到了解放。实际上“文艺复兴”在西文中的正确解释是“古典学术的再生”。文艺复兴在精神方面的表现,主要是恢复古希腊时期开始的“自然科学”。^③当时,中世纪残留下来的教会的力量还很大,神学仍然压制着文学艺术。针对教会对文艺的摧残,具有人道主义思想的学者起来“为诗辩护”。在意大利,但丁(1265—1321)最早起来为诗辩护。我们要知道,但丁生活的年代,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元代中期,当时的中国文学已经跨越了汉赋、六朝诗歌、骈体文、唐诗、宋词、唐宋古文、唐宋传奇、元曲等辉煌的金色时期,产生了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杜牧、苏轼、李清照、柳永、陆游等一大批伟大不朽的诗人和作家,而古老的诗篇早于汉代就被尊称为《诗经》,但生活在西方的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最后一位诗人”的但丁,在文艺复兴运动的鼓励下,才开始羞答答地为诗辩护。但丁提出文学的“寓言”说,“从宗教的观点为诗辩护”。

^① 亚里斯多德:《诗学》第9章,参见《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9页。

^② 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价值意义》,《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阐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③ 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页。

其后,还有薄伽丘、帕屈拉克等在重复但丁的“寓言”说的同时,提出文学的虚构不是说谎,“真理埋藏在虚构这幅帐面纱后面”,“诗和神学可以说是一回事”,“神学实在就是诗,关于上帝的诗”。^① 还是怕神权,不得不如此为诗辩护。比但丁稍晚 200 年左右的英国文学家菲利普·锡德尼(1554—1586)针对当时仍然有人认为诗人、演员和剧作家欺骗公众、败坏道德,写出了第一篇以《为诗辩护》为题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说,自然的“世界是铜的,而只有诗人才给予我们金的”^②,这才给出了一个像样的理由。

三、西方文论史上第三次“为诗辩护”

第三次为诗辩护发生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这是在科学面前为诗辩护。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兴起,工厂遍地林立,烟囱冒着黑烟,童工超时打工,城市挤压乡村,田园逐渐丧失。科学技术成为统治世界的力量。科学主义甚嚣尘上。似乎只有科学才发现真理,文学艺术与真理根本不相匹配。科学不但发现真理,而且有用,有用的才是可以存在的,文学艺术受到科学的挤压而再次经历危机。很少人重视现代的工业给环境带来污染,并使人性变得残缺。这个时候产生了英国浪漫派,出现了湖畔诗人华兹华斯(1770—1850)和柯尔律治(1772—1834)等。他们出来为诗辩护。他们非但对工业革命不感兴趣,而且呼应回归自然。“大自然啊! 大自然!”这是华兹华斯的口号。他的著作《〈抒情歌谣集〉序言》以丰富而独特的思想反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许多的原因,从前是没有的,现在则联合在一起,把人们的分辨能力弄得迟钝起来,使人的头脑不能运用自如,蜕化到野蛮人的麻木状态。这些原因中间影响最大的,就是日常发生的国家事件,以及城市里人口的增加。”^③ 所谓“国家事件”,所谓“人口的增加”,就是当时现代工业的崛起,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种种灾难。他呼唤失去的田园生活,说:“我通常都选择微贱的田园生活做题材,因为在这种生

^① 参见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52 页。

^② 锡德尼:《为诗辩护》,见《为诗辩护 试论独创性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0 页。

^③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 页。

活里,人们心中的热情找着了更好的土壤,能够达到成熟境地,少受一些拘束……因为田园生活的各种习俗是从这些基本情感萌芽的,并且由于田园工作的必要性,这些习俗更容易为人了解,更能持久;最后因为在这些生活里,人们的热情是与自然的美而永久的形式合而为一的。”^①华兹华斯为了反驳那些只有科学才发现真理,诗歌不能发现真理的说法,强调:“我记得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的确是这样。诗的目的是在真理,不是个别的和局部的真理,而是普遍的和有效的真理;这种真理不是以外在的证据做依靠,而是凭借热情深入人心;这种真理就是它自身的证据,给予它所呈现的法庭以承认和信赖,而又从这个法庭得到承认和信赖。”^②华兹华斯进一步把自然科学与文学艺术作对比,说:“科学家追求真理,仿佛是一个遥远的不知名的慈善家;他在孤独寂寞中珍惜真理,爱护真理。诗人唱的歌全人类都跟他合唱,他在真理面前感到高兴,仿佛真理是我们看得见的朋友,是我们时刻不离的伴侣。诗是一切知识的菁华,它是整个科学面部上的表情。”^③华兹华斯对于现代工业的批判,对于古老田园生活的神往,对于回归自然的呼喊,都能给我们以启发,令我们感动,甚至到今天仍然有它的意义;但是他为什么要站到“科学家”的立场上为诗辩护呢?他辩护的逻辑是,诗歌不是不能发现真理,它的真理比之于科学所发现的真理更能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全人类都跟着合唱。就是说,华兹华斯为诗辩护诚然让人佩服,但他对文学价值的理解,仍然离不开“科学”和“真理”。文学艺术为什么一定要和科学去比真理性呢?

比华兹华斯晚一点出生却早去世的雪莱(1792—1822)在题为《为诗辩护》的文章中,也许比华兹华斯说得更好。雪莱认为科学与诗是不同的,科学重在“推理”,而诗则重在“想象”。“诗可以解作‘想象的表现’。”^④而且他提出了文学艺术的“美与真”的问题,不但把语言艺术的创造与人的天性联系起来,而且考虑到语言的本性,他说:

^①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17页。

^④ 同上书,第119页。

狭义的诗却表示语言的、尤其是具有韵律的语言的特殊配合，这些配合是无上威力所创造，这威力的宝座却深藏在不可见的人类天性之中。而这种力量是从语言的特性本身产生的，因为语言更能直接表现我们内心生活的活动和激情，比颜色、形相、动作更能作多样而细致的配合，更宜于塑造形象，更能服从创造的威力的支配。^①

雪莱同样也说诗人是“法律的制定者”，是“文明社会的创立者”，是“人生百艺的发明者”，但同时他不是一味说大话，而是从语言的特性出发，具体地论述了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对于人的内心生活和人的情感的独特长处。这样的辩护比什么都有力量。后来，欧洲文学有了从18世纪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文学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发展，产生了一大批伟大的诗人作家，他们的作品，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有力地证实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诗辩”。

四、西方文论史上第四次“为诗辩护”

随着19世纪德国哲学的繁荣，德国古典哲学成为人类精神发展的表征。康德、费希特、席勒、谢林、黑格尔等都热爱包括文学在内的艺术。黑格尔与华兹华斯都生于1770年，1831年死于当时德国流行的霍乱病。大家知道，黑格尔前后讲过五遍美学课，1817年、1819年在海德堡大学讲过两次，1820—1821年、1823年、1826年在柏林大学讲了三次，我们现在看到的《美学讲演录》（朱光潜先生译名为《美学》）就是他的学生霍托根据1823年、1826年的听课人的课堂笔记对照黑格尔历次讲课的提纲整理而成的。但随着黑格尔的哲学体系的完成，“艺术终结论”也提出来了。

华兹华斯的《〈抒情歌谣集〉序言》最早版本是1815年，后来不断有修改。大体而言，黑格尔讲美学的时间比华兹华斯发表《序言》的时间稍晚一些。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客观唯心主义体系。这个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就是“绝对精神”。他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物质而是精神，

^① 华兹华斯：《〈抒情歌谣集〉序言》，《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3页。

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但他的“绝对精神”又不是属于人的主观的精神，而是独立于个人之外的，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并将永恒的存在下去的“客观的思想”。他把这个派生出整个世界的“客观的思想”称为“绝对理念”。这个“绝对理念”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僵死地存在着，它包含一种永无止境的矛盾运动。那么，文学艺术是什么呢？它们如何运动呢？在黑格尔看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理念在显现为各种艺术的时候，是按照象征型艺术开始——跨进了古典型的造型艺术——最后终止于浪漫型艺术。从诗的运动角度说，则是史诗——抒情诗——戏剧体诗的过程发展的，在戏剧体诗经过悲剧和喜剧之后，终于走完理念在艺术领域的全部行程，或者说得到了完全的实现，这样，理念就要越出艺术的感性形式向更高的阶段——宗教、哲学——发展。所以黑格尔说：“到了喜剧的发展成熟阶段，我们现在也就达到了美学这门科学研究的终点。”^①又说：“到了这个顶峰，喜剧就马上导致一般艺术的解体。”^②这时候，绝对精神将走向更高阶段的宗教和哲学。需要说明的是，黑格尔的思想是矛盾的，按照他的“绝对理念”的逻辑，艺术终结论是必然的；但按照他的历史发展的观点，艺术是无止境的。黑格尔有一个“扬弃”的观点，对于艺术来说“扬弃”就是既保留又抛弃。总有一些东西被保留，但不利于“理念”运动的东西不被保留，最终要被抛弃。

在当时，稍小黑格尔几岁的谢林，是一位明确使用“先验唯心论”这个概念的哲学家。谢林的观点是，艺术是至高无上的，艺术紧紧把握住理念与现实的统一。哲学似乎是可以企及的最高事物，但仅能让少数人达到这一点，艺术则是按照人的本来面貌引导全部人达到这一目标。所以他的观点与黑格尔是不同的。一百多年来，对于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谈论很多，但真正赞成他的人很少。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不过是披着外衣的神性而已，因此他的哲学逻辑或者说神性如何能干预人类的现实文学艺术的终止呢？

五、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为诗辩护”

当前，我们又一次不得不为诗辩护，这是第五次“为诗辩护”，是

^① 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34页。

^② 同上。

在电子技术面前为诗辩护，在高科技图像面前为诗辩护。这一次，是解构主义理论家德里达挑起的。他认为文学和情书将随着电子图像的流行而走向终结。中国当代一些年轻的或不太年轻的学者也跟着喊。这次“为诗辩护”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回响。我也参加了此次争论^①。

“文学终结”近几年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美国知名学者希利斯·米勒的文章《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以后，在中国这种讨论就开始了。米勒在这篇文章中说：

新的电信时代无可挽回地成为了多媒体的综合应用。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而后者用一大堆既不是现在也不是非现在、既不是具体化的也不是抽象化的、既不在那儿也不在那儿、不死不活的东西冲击着眼膜和耳鼓。这些幽灵一样的东西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侵扰那些手持遥控器开启这些设备的人们的心理、感受和想象，并且还可以把他们的心理和情感打造成它们所喜欢的样子。因为许多这样的幽灵都是极端的暴力形象，它们出现在今天的电影和电视的屏幕上，就如同旧日里潜伏在人们意识深处的恐惧现在被公开展示出来了，不管这样做是好是坏，我们可以跟它们面对面、看到、听到它们，而不仅是在书页上读到。我想，这正是德里达所谓的新的电信时代正在导致精神分析的终结。^②

米勒相信：这是电信时代的电子传播媒介的“幽灵”，“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并认为“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成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从而导致文学的终结。文学终结了，“那么，文学研究又会怎样呢？文学研究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

^① 参见拙文《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人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文学争鸣》2005年第3期。

^② J. 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